

逃亡和救援

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特别展

1939年9月爆发的那场战争使得居住在波兰境内德国和苏联占领区内超过3百万的犹太人陷入了困境。只有极少数人从终将导致全面“大屠杀”的恐怖中侥幸地逃过一劫。从1940年末到1941年初，就在“大屠杀”开始前的几个月里，约有2100名左右的波兰籍犹太人逃亡至远东和更遥远的地区。在这个漫长的逃亡过程中，他们搭上了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再乘蒸汽机船到达日本。这离他们在立陶宛最初的庇护所东去有6000公里之遙。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最后流亡到了上海。

如果没有许多人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帮助，这些犹太人根本没有几个人能成功地逃到安全地区。在他们逃亡途中，有若干犹太人组织和犹太人社区向他们提供资金和其他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援助却来自以下两个意料之外的地方：即荷兰流亡政府的代表们和纳粹德国的同盟国——日本。他们在1940年夏天从事的人道主义活动，乃是数以百计来到立陶宛寻求庇护的犹太人终能得救的关键之举。

“我们牢记了世界各地的地图和各国的轮廓，像专家似的向使节和领事们描绘出最为错综复杂的行进路线。如果前面没有路，我们就必须开创出一条路；即使暂时只能在纸上谈兵。”

——流亡者领袖 Zorach Warhaftig，战后回忆录

大逃亡

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

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后，数十万犹太人和不计其数的其他波兰居民赶在纳粹德军到达他们的居住地之前向东逃亡。9月17日，苏联军队与德国达成秘密协议，随后便占领了波兰东部地区。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之下，该地区有大约30万犹太难民为了逃避德国的统治，被迫接受苏联的统治而留下来。在未被占领地区，约有4万犹太人因为惧怕被纳粹或苏联拘捕或希望移居国外，有的向南进入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有的则向东北方向进入了立陶宛。

当维尔拉（Vilna）和其邻近地区将于10月份从苏联转由立陶宛统制的消息传出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便涌向这座几世纪之久的犹太文明中心。然而，当新的国界封锁后，进入立陶宛的风险变得更大，后来许多尝试逃入立陶宛的犹太人都难逃被遣返的命运。

“一大群人在恐慌中出发... 人们纷纷远离家园，展开一段危险重重、前途未卜的逃亡旅程。”

——取自 Dawid Sierakowiak 的日记，1939年9月6日于波兰罗兹

“我们的国家被两股贪婪和愤世嫉俗的势力所吞没，他们都试图控制整个世界。在波兰的犹太人有350万之多，是世界上最大的犹太人团体，而现在，他们却面临着灭顶之灾。”

——难民领袖 Zorach Warhaftig，战后回忆录

避难

立陶宛的临时避难所

在 1939 年的秋冬季节，约 1 万 5 千名波兰籍犹太人选择政治上中立的立陶宛作为他们的临时避难所，其中大部分人留在了维尔拉（Vilna）。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类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深受战祸的波兰，他们因为其犹太民族的文化思想、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而面临迫害。一些家庭运用金钱渠道逃离战争和沦陷带来的危险。许多流亡者希望最终到达美国或是巴勒斯坦。

大部分流亡者在逃亡时仅携带了很少的财产，而在立陶宛又不允许工作，所以他们只能依靠他人的帮助才得以生存。其中最大一笔救济物资和救济金来自一个美国犹太人慈善组织——联合救济委员会。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牵挂着仍处在沦陷的波兰境内的亲属，逃亡者只能默默祈祷，祈祷战争尽快结束或者立陶宛的中立地位能不被动摇。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希望无一实现。

流亡者概况

大部分的成年男性难民是有组织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人（他们矢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战前波兰宗教学校（神学院）的犹太学者和学生。他们在立陶宛继续他们的研究学习和训练活动。流亡者中也有商人、律师、教师、记者和医生。他们大部分人处于失业状态，或在难民社区中做志愿者。在施粥站和咖啡馆，作家和政治活跃分子谈论着关于战争的新闻。部分人的移民申请被拒绝，因为立陶宛政府害怕因为移民问题而影响它的中立地位，并禁止处于参军年龄的波兰籍公民离境。

“逃亡到立陶宛的犹太人的处境其实不比那些在德国和苏联占领区内的犹太人好到哪里去。”

——犹太复国运动领导人 Moshe Kleinbaum，1940 年 3 月 12 日于维尔拉

Zorach Warhaftig

Zorach Warhaftig 是华沙的一个律师，同时他也是犹太复国运动组织 *He-Halutz Mizrachi* 的领导人。尽管本身已是一个逃亡者，他尽最大的努力营救波兰被占领地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在维尔拉城郊外为他们建立训练农场。Warhaftig 为驻立陶宛的巴勒斯坦联合会工作，这个联合会致力于帮助波兰籍难民，而他的工作是帮助 *aliyah* 活动（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他帮助 500 多名难民经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法国逃到那里（巴勒斯坦），而这条路线在德国入侵欧洲西部后被封锁。1941 年年初，在他的帮助之下，700 多难民经过土耳其成功逃亡。

救济行动

无数机构和立陶宛政府和红十字会一起向逃亡的犹太人提供了救济。其中要数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规模最大。它向在维尔拉和考那斯的犹太人救济委员会提供资金来帮助难民。联合救济委员会派出了一个活跃的美国人 Moses Beckelman 和 Yitzhak Gitterman 一起工作（这位流亡者把该组织在华沙的办事处搬到了维尔拉）。这个充满活力的团队为难民们建立了集体居所和施粥处，向他们分发衣服和鞋子，同时还提供其他服务。

“如果没有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的资金，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会感到被抛弃了。”

——美籍救济工作者 Samuel Schmidt，于 1940 年 3 月 17 日

Moses Beckelman

Moses Beckelman 是一位纽约市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他在 1939 年开始为联合救济委员会工作。在立陶宛，面对众多的政府规定和有限的财政资源，他证明了他是一位机智的谈判代表，竭尽所能为难民争取更多的救助。1939 年 12 月，**Beckelman** 带着详细描述纳粹在德

国占领的波兰地区迫害犹太人的报告离开立陶宛，但是德国人在波罗的海拦截了他搭乘的船，并拘禁了船上所有波兰籍处于参军年龄的人。他们允许 **Beckelman** 返回立陶宛，之后，他一直致力于帮助难民直到 1941 年 2 月。

为身处波兰沦陷区的家人担心

逃亡者们经常为仍身处在沦陷区的家人而忧心忡忡。在德国占领波兰的之初的几个月里，所有的波兰居民几乎有着同样的遭遇。但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隔离政策和迫害手段更包括了：集体强制劳工、命令穿上带有特殊标记的衣服、与在罗兹建立首个主要的犹太人区以拘禁犹太人。许多逃亡者试图带着家人进入立陶宛，但是每一个成功非法进入的例子之后就有个失败者。很多犹太人根本没想逃离波兰，因为他们害怕被逮捕，并且放不下年迈的父母亲和年幼的孩子。

苏联的占领

逃亡者面临的危险处境

1940年6月15日，苏联的军队侵占了立陶宛。之后不久，共产党领导开始改造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权。在经过暗箱操作的公投后，立陶宛于该年8月4日成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的政权派出了苏联秘密警察（以下简称 NKVD），他们的目标是那些政治立场左倾或右倾的反共产主义者。在维尔拉和考那斯，逃亡者中的政治活跃分子不得不变得行事低调，有些人甚至换上假的身份。因为没有固定的住所和工作，难民们处境可危。许多人并不想加入苏联国籍，尽管那样相对来说显得安全点，然而一旦如此，他们重返家园的梦想就彻底破灭了。而不肯加入苏联国籍就意味着可能被当作“不可靠分子”而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其他寸草不生的地区。居住在苏联占领的东部波兰地区数万名难民早已遭受此种“待遇”。

“四处烟雾弥漫。... 整天都有苏联的坦克经过。事态动荡不安，我们这些可怜的逃亡者能做的只是恐惧和颤栗。”

——Rose Shoshana Kahan，1940年6月14日于维尔拉。

“在夜幕的笼罩之下，拘捕行动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整个国家都笼罩在这样一种恐怖和不安的气氛中。”

——美国领事 Owen Norem，1940年7月25日于考那斯。

救援行动

从荷兰和日本的外交官处获得帮助

在苏联占领立陶宛后，难民们再次陷入绝境。几个星期前德国入侵欧洲西部，和之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相继沦陷的消息，使人们对西部战争早点结束的幻想破灭。

逃亡的选择余地很小，所有的逃亡途径都需要外交许可（即签证）才能穿越国界。当苏联勒令所有的领事馆在 1940 年 8 月 25 日前关闭，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没有签证，这些逃亡者们只能继续滞留在共产党人控制下的立陶宛。

对于少数幸运的人来说，逃离即将到来的危险的途径是往东走，使用不同的签证组合去往亚洲：一张去往荷兰加勒比岛的 Curaçao（他们中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地方）的假签证和一张经过日本的通行证。各国的外交使节分发了这些宝贵的签证来帮助这些等在他们门外的绝境边缘逃亡者。

入境限制

逃亡者首选的目的地是美国和在英国控制下的巴勒斯坦。但是严格的法律和政策却限制了他们入境到这两个地方。唯一的希望是在国外机构的帮助下，绕过正规的移民程序出境。即使有来自他方的担保人，时间上也来不及了，立陶宛的领事馆已陆续被迫关闭。美国领事馆只能提供 55 张签证，而英国外交大使争取发放了 700 张去往巴勒斯坦的签证，提供给那些犹太复国主义青年、犹太学者和其他一些团体。

来自荷兰人的帮助

签证难题出乎意料的在荷兰位于考那斯的领事馆处得到突破。荷兰驻波罗的海各国大使 L.P.J. de Decker 授权他在立陶宛的代理领事 Jan Zwartendijk 分发通行证，并宣称：

“外侨进入 Surinam、Curaçao 和其他荷兰在美殖民地不需要准入签证。”然而，这其实

是一个有意的谎言，事实上发放准入证是殖民政府的特权，而他们很少这么做。

“如果有人够得上被称为是‘Curaçao 的天使’（那一定非 de Decker 莫属）... 正是 de Decker 阁下给了我们顺利拿到冒充签证所必须的文件。”

——Jan Zwartendijk，战后讲述

L. P. J. de Decker

大使阁下

L.P.J. de Decker 在荷兰外务部任职的 34 年职业生涯中，曾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担任外交官。1939 年，他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担任荷兰驻该地大使。苏联勒令关闭波罗的海各国所有的领事馆后，de Decker 去了斯德哥尔摩。他于 1948 年逝世，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为逃亡者提供冒充签证时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Jan Zwartendijk

“飞利浦收音机先生”

Jan Zwartendijk 在一个名叫飞利浦的生产灯泡和收音机的荷兰公司工作了四年，并于 1939 年 5 月成为该公司在立陶宛业务的主管。1940 年 8 月初，苏联人查封了他在考那斯的办事处，中断了他的工作和发放“Curaçao 签证”的活动。一个月后，Zwartendijk 回到了被德国占领的荷兰，在 Eindhoven 的飞利浦总办事处继续工作。若干年后，那些得到过他帮助的人只知道他叫“飞利浦收音机先生”。

“在这段灾难的历史时期，那个发放通行证的日本领事扮演了一个有意思的角色。他好几次通过电话要求减缓发放签证的速度。他的动作不够快，因为大街上都挤满了等待签证的人们。”

——Jan Zwartendijk，战后讲述

日本通行证

逃离战祸连天的欧洲并到达 *Curaçao* 意味着需要穿越太平洋，因在立陶宛任职的日本代理领事 Chiune Sugihara 使得这条逃亡路线变得可能。在没有得到东京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他给数以百计的持有以 *Curaçao* 为最终目的地签证的难民发放了 10 天有效期的过境日本的通行证。在关闭领事馆之前，Sugihara 甚至给那些没有任何移民文件而只想尽早离开立陶宛并从别处获得去美国的签证的难民发放通行证。

“最后，我做出决定，和东京方面继续争论下去是毫无用处的。我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我在关闭领事馆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开始不经官方允许擅自发放日本通行证。”

——Chiune Sugihara，在战后采访中讲述

Chiune Sugihara

日本帝国的领事

Chiune Sugihara 是日本驻立陶宛的第一位外交官。他在满洲里的哈尔滨呆了 16 年，向该地区的俄罗斯移民学会了说流利的俄语。1939 年末，他被派到考那斯收集有关苏联和德国军队动向的情报。1940 年 9 月初，Sugihara 离开立陶宛，并荣升为二等外交官，被派往布拉格、科尼斯堡和布加勒斯特等地。1947 年，Sugihara 回到当时被美国占领的日本之后，外务部大量裁员，被解雇时他只领到一笔很小的养老金。

电报往来

在发放了约 1800 张通行证后，Sugihara 最终收到了位于东京的外务部关于他发回的立陶宛局势的报告的回应。1940 年 8 月 16 日，东京方面说，那些持有他发放的通行证并最终要去往美国和加拿大的难民，在到达日本时身无分文或者根本没有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签证。“你必须确保他们在获得通行证过程中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程序。同时，你必须保证他们带够了行程途中和在日本逗留时所需要的钱。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该给他们通行证。”

9月1日左右，在 Sugihara 给东京的回复中，他承认确实给那些并没有完成最终目的地签证的所有程序的人发放了通行证。他解释了当时情有可原的情形：日本是难民从苏联去往美国途中唯一可能拿到中途签证的国家，而他的签证是难民离开苏联所必须的。同时他也表明，到达苏联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难民，如果所带的相关文件不完整，则不允许坐船到日本。东京回复他说：苏联坚持认为日本认可所有由其领事发放的通行证。

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

在 1938 年末的一封电报中，日本外务部通告其在外大使：采取反犹太人的态度并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应该向对待其他外国人一样对待入境的犹太人。这封电报陈述了高涨的难民问题。1938 年的秋天，维尔拉、柏林和德国其他城市的日本领事馆前围满了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他们想获得去往上海、日本、或经由日本去往其他目的地的签证。

“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和德国、意大利保持密切的关系对于日本帝国的外交政策来说至关重要。我们应当避免积极主动地收容那些被我们的盟友驱逐的犹太人，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像德国那样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并不符合日本帝国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种族平等的精神。在当前日本帝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下，这样做同时会给战争的进程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特别是将对引进外资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对美关系造成不良影响。”

“在这个国家，共产党的势力迅速膨胀。在 NKVD 的影响下，恐怖袭击事件此起彼伏。... 每天都有近 100 个人来这里，那些犹太人群集在我们大楼前，请求我们给他们发放经由日本去往美国的签证。”

——Chiune Sugihara, 1940 年 7 月 28 于考那斯

旅程

搭上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去日本

1940年末，苏联占领的立陶宛政府勒令所有的难民要么加入苏联国籍，要么被当成“不可靠分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逃离立陶宛的压力骤然变大。某些难民搭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安全到达东边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消息鼓舞了数以百计的犹太难民，他们向苏联申请出境签证。为什么苏联会允许这些持有波兰旅行文件（其中大部分文件的有效性还值得怀疑）的难民出境，至今还是一个谜。难民的特殊情况反而给他们提供了移民的机会，他们踏上了一条与留在苏联统治下的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截然不同的道路。

并不是所有的难民都在 Zwartendijk 和 Sugihara 的帮助下逃离立陶宛来到日本。部分人根本就出不起苏联方面收取的昂贵的火车票钱。尽管“联合救济委员会”给数百人出资购买火车票，这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我们百感交集，忧喜参半。我们将会到达一个安全的地方，还是这仅仅是苏联为了看出谁想逃离他们的“伊甸园”而耍的另一个诡计？... 从未听说过共产主义苏联曾允许人民移民出境。”

——Benjamin Fishoff，战后回忆录

“当我们坐在船上穿越海洋向日本驶去，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船驶出苏联领海的那一刻的到来。这个时刻最终来临了。红色的旗帜降了下来，苏联官员随后下船。自由就在前方。日本即将成为我们真正的‘日出之国’。”

——Oskar Schenker，于 1941 年 9 月

进退两难

焦急地寻求去往最终的目的地的签证

当来自立陶宛的 2100 名波兰籍犹太人到达日本的神户时，大部分人已经筋疲力尽身无分文。通过犹太人联合会的倾力照顾和联合救济委员会的资助，他们才得以恢复生机。少数人很快就成功移民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但是仍有数以百计的人在神户滞留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大部分难民却不能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领事馆处得到他们所要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签证。

未来的不确定冲淡了这些短暂的停留者对富有异国情调的日本的感激之情。他们无止境的牵挂和担心着仍处在被占领的波兰的亲友，这种情绪在他们听到德国于 1941 年 6 月 22 日入侵苏联后变得更加严重。同年 7 月，美国截断了日本的石油进口渠道。日本随后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在看到神户的日军演习场景后，这些难民们的神经再度绷紧，因为，一场太平洋上的战争已迫在眉睫。

来自神户的犹太人联合会的帮助

经过日本政府同意，神户的犹太人联合会代表在 Tsuruga 见到了刚到达这里的身无分文的难民们，然后伴随他们登上了去往神户的火车。Anatole Ponevejsky 领导的犹太人联合会利用主要由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提供的资金，在神户建起了集体居所，为难民们安排食宿，并和当地政府交涉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

“没有人想着『圣经』里的出埃及记，只想到还需越过无数严禁的国境，不知前路还有多少困难艰险。我们将要去向何方？”

——Rose Shoshana Kahan，于 1941 年逾越节

Anatole Ponevejsky

Anatole Ponevejsky 生于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次克。1930 年，他和兄弟们来到满洲里的哈尔滨。在那里，他们开始从事进口日本毛纺织品的生意。1935 年，Ponevejsky 来到日本从事出口贸易，之后不久，他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便在日本神户定居。他组织了由 25 个家庭组成的东欧犹太人联合会，并在 Tamamoto-Dori 街租了一幢房子。房子里有一个犹太教会堂，一个会议中心，并在 1940 至 1941 年间设立了难民救济办公室。战后，Ponevejsky 在东京开了个零售店，而 Chiune Sugihara 曾在东京短暂工作过。

为签证而开始新的奔忙

“Curaçao 签证”使逃亡者们顺利离开了苏联。而对于到达日本后的旅程，它却无能为力。为了寻求有效的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签证，他们整天围在神户、横滨和东京的领事馆前。超过 500 名波兰籍犹太人顺利获得去往美国的签证，但是美国新的战时移民限制政策并没有给另外数百人机会。去巴勒斯坦的签证更加稀缺，同时其过程更加复杂，费用也更加昂贵。

“被来自欧洲不断扩大的移民潮所吓倒——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波罗的海各国的犹太人——美州各国冷酷地关紧了他们的大门。”

——波兰大使 Tadeusz Romer，1941 年 1 月 15 日于东京

Tadeusz Romer

Tadeusz Romer 是波兰某贵族的后裔，他于 1937 年 2 月来到日本担任波兰驻日大使。在 1940 和 1941 年间，他报道了在日本的波兰籍难民的详细信息和领事官员提供给他们的帮助，包括发放正式的身份证明文件，在 Tsuruga 接船以简化入境手续和帮助那些已拿到签证的人去往英国控制的地区。Romer 呼吁波兰的同盟国正确对待远东地区的波兰籍难民：

“别因为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或政治倾向而歧视他们。”

“最终处置”开始

在滞留日本期间，难民们一直很担心那些失散的亲人的命运。从家乡寄来的明信片给他们带来些许的安慰。然而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军队进攻苏联以后，邮件和电报的通讯自此中断。在维尔拉和其他被德军占领的苏联领土上，纳粹和他们的同盟们开始大肆屠杀犹太人，自此揭开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序幕。而那些逃亡者在战争结束之前听到很少关于“大屠杀”的消息，也不知道他们亲友的命运到底如何。

当日本人遇上犹太人

日本公众对犹太难民热情而好奇。在他们的眼里，犹太学者和神学院的学生特别的不一樣。在神户，前卫的 Tanpei 摄影俱乐部对犹太难民很感兴趣。该俱乐部的成员在 1941 年 4 月末的那段时期拍了很多关于那些难民的照片。战争结束后，很多难民都能回想起当时日本人对他们的好奇心，并记起他们并没有遭遇到如同战前的波兰当时的反犹太人的态度和行为。

“尽管日本和德国是关系密切的盟友，但在当时的日本却没有出现歧视犹太难民的事件，当地的报纸也没有出现不友好的论调。”

——美国副领事 Roy M. Melbourne，1941 年 5 月 22 日于神户

“流浪徘徊的犹太人”

大阪的 Tanpei Shashin 俱乐部的成员在 1941 年 4 月的两天内拍了很多以难民为素材的照片。1941 年 5 月期间，大阪 Asahi Kaikan 展览馆以“流浪徘徊的犹太人”为题展出了其中的 22 件作品。Kaneyoshi Tabushi 在 *Asahi Camera* 杂志上发表了关于这些犹太神学院学生（其中称之“男人”）的评论，他写道：“这些徘徊者眼中流露出的不仅是悲伤和痛楚，.. 还有被迫流落到世界各地的沮丧后的坚强。种种困难迎面而来。不被艰难打败本身就是一场战役。”

最终的目的地

到 1941 年秋天为止，超过 1000 名波兰籍犹太人离开了日本去到更能久居的目的地。近 500 人坐船前往美国，另有一小部分人在波兰大使 Romer 的帮助下获得进入加拿大和其他英国统制区的许可证。但仍有近 1000 人因为没能获得任何地方的签证而继续滞留当地。在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前几周里，警察扫清了神户的军事港口。从 1941 年 8 月中旬到 10 月末，日方把剩下的难民遣送至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上海。

流放

在战时的上海生存

还在日本时，波兰籍犹太难民们就听说上海是一个脏乱拥挤、犯罪肆虐的“地狱之窟”。然而上岸后，他们仍然被当时迎接他们的景象和气氛所震惊。他们发现，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成百上千的穷苦的中国人居住在由英美商人和金融家等富有阶层组成的外国人社区里。这些难民找到了一个已成立的联合会帮助他们。该联合会是由 4000 多俄罗斯籍犹太人组成的。在他们之前，已有超过 1 万 7 千名为了逃脱纳粹迫害的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接受过他们的帮助。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些犹太难民不得不暂时滞留在上海。他们缺乏食物、衣物和医疗条件，处于失业状态，同时又得不到有关他们家人的任何消息。在被迫遵守无数的日本法令的同时，他们被强制以“无国籍难民”的身份居住在“指定地区”（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尽管如此，这些难民们在上海的遭遇还算相当不错的。在战后当他们听到关于“大屠杀”的种种惨事时，才认识到他们是幸运的一群。

德国籍犹太人难民联合会

大多数在上海的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难民居住在拥挤、废弃的房舍里，这些破旧不堪的集体宿舍（被谑称为 Heime 或 homes）是由美国犹太人联合救济委员会出资建造的。尽管如此，这些早期到达的难民非常善于勤俭持家。有些人经营起了小商店和家庭作坊。另外有些人开始把自己当作虹口区的建设者和地主，试着改造虹口。虹口是公共租界内的一个工业区，在 1932 年和 1937 年中日战争期间被夷为平地。

Laura Margolis

Laura Margolis 是联合救济委员会在海外职员中的唯一一名女性，她曾在 1939 年帮助过那些想要进入古巴的德国籍难民。1941 年 5 月，她被派到上海工作，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

发却使她无法继续帮助那些难民移民。Margolis 从上海的犹太人联合会筹集资金，帮助了近 8 千名难民。在 1942 年初，她被日本人当作通敌者拘禁起来。1942 年 8 月，在美国和日本的战俘交换中，Margolis 得以返回美国。

“上海犹太人区”

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后，在上海的日本当局执行了更为严格的安全措施。1943 年初，在接受纳粹同盟通过取消德国籍和奥地利籍犹太人的国籍使他们成为“无国籍”者的政策后，日本人随即命令那些包括来自波兰的犹太人在内的无国籍难民只能居住在公共租界的“指定地区”。尽管没有遭受到类似那些在欧洲的犹太人所遭受的种族灭绝惨剧，然而，狭小的活动区域和战争的残酷使得“上海犹太人区”难民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该命令的宣布犹如一枚炸弹投向了上海的犹太人。... 对饱受煎熬的难民们来说，这就像世界末日的来临，他们之前再怎么想也想不到。”

——Laura Margolis，于 1944 年

文化和政治

波兰籍犹太人作家用一句依地俚语来形容在上海的岁月：*shond khay*，即“一生中的耻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情绪，然而还是要在这个陌生而孤立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难民们阅读依地语诗歌，出版依地语和波兰语的报纸，创作艺术作品并举行各种比赛。虽然出于物资匮乏和日本管制的原因，这些文化活动显得小而零散，然而正是这些星星点点的活动使得波兰难民的文化得以延续。日本人禁止他们搞政治活动，但是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纳粹派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在秘密地组织活动。

米尔神学院联合会

难民中的神学院学生在战争年代仍然坚持学习。他们所用的课本有的是那些少数从波兰一路带到上海的复刻版，有的是支持者寄过来的。其中最出名的一位支持者要算身在纽约的

学者 Rabbi Kalmanovich。米尔神学院学生集中在 Beth Aharon 犹太教堂学习和活动，该教堂是由一位富有的上海西班牙系犹太人联合会成员出资建造的。在难民领袖的领导下，米尔神学院选择从波兰来到日本和上海，之间经历了种种磨难，然而他们是“大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欧洲东部地区的神学院。

战争的结束

战争即将结束前，一颗由美国人扔下的炸弹在虹口区爆炸，使得 40 名犹太难民（其中有 7 名波兰籍犹太人）和数以百计的中国人丧生。美国军队进驻上海所激起的欢庆氛围还没持续多久，人们的情绪便因听到关于大屠杀的消息而急转直下。大多数难民在 1941 年春天前更本没有听到任何关于他们留在波兰占领区的的亲属的消息。至少几个月之后他们才会得知亲人和朋友的命运。约 6 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遇难，其中 3 百万是波兰籍犹太人。

“所有在波兰的犹太人都遇害了的传言是真的。... 我们这些犹太难民走到何处都带着满脸泪痕，因为我们把全部家人都撇在了地球的另一端。很多人的心里都充满了负罪感，因为他们生存了下来，而他们的亲人们全都惨死了。”

——Rose Shoshana Kahan, 1945 年 8 月于上海

死亡

“请上帝记住，请上帝务必记住；我们不会要求更多。只请您记住 5,700,000 这个数字吧。”

“5 百 70 万——在写下这个数字时，我们的心为之滴血，大地为之震颤。”

“从年迈的祖父到年幼的孙子，我们同时失去了三代人。他们在同一天内惨遭屠杀。波兰的大地在恸哭，立陶宛的树林在抽泣，整个欧洲在哀嚎——我们犹太人都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们的土地转眼之间就变成了他们的坟墓？”

家族冒险旅程

Melamdowicz

Icchok Melamdowicz 在战前是一名数学教师，同时也是波兰 Bialystok 市的市议员。1939 年 9 月 8 日，因害怕被德国抓住当作人质，他和其他杰出的市民一起逃离了该市。苏联的军队在一星期后占领了该市，因害怕被苏联人拘捕，Icchok 并没有回到家乡。1939 年 10 月末，他的妻子 Fejgla 和儿子 Lejb 在维尔拉与他会合。1941 年 1 月，在得到 Sugihara 签出的最后两张签证的 5 个月后，他们全家离开了立陶宛。当年 4 月，他们从日本乘船到了美国。

Sondheimer

Moritz Sondheimer 是一名德国籍犹太人，他在 1934 年离开纳粹德国。在立陶宛，他开了一家生产塑料纽扣和梳子的小型工厂。1940 年夏天，苏联人查封了他的工厂。当年 8 月，他和妻子 Setty 还有两个孩子 Hanni 和 Karl 一起从 Zwartendijk 处得到了“Curaçao 签证”，并在 Sugihara 处得到过境日本的通行证。他们是拿到签证为数不多的人当中的非波兰籍公民。1941 年初，他们来到日本。但是由于没有取得去往最终目的地的签证，他们于当年夏末被遣送至上海。战后，他们移民到了美国。

Dymant

1939 年 9 月 5 日，法学学生 Jakub Dymant 听到收音机里传出让所有处于参军年龄的男人赶在德国军队到来之前逃离华沙的消息。10 月 23 日，他来到维尔拉。1940 年 8 月，Jakub 从 Zwartendijk 处得到“Curaçao 签证”并从 Sugihara 处得到过境日本的通行证，然后在 1941 年 2 月离开立陶宛。在日本停留了 5 个月后，他在波兰大使 Tadeusz Romer 的帮助下得到一张去往缅甸的签证。1942 年初，日本军队进攻缅甸，Jakub 又逃到印度。1946 年，他来到美国。

Swislocki

战争爆发前，Abraham Swislocki 是华沙的一名新闻记者，他的妻子 Masza 是一名工业化学药剂师。德国入侵波兰后，他被招为军事记者，之后来到维尔拉。在经历一段危险重重的旅程后，Masza 和她的儿子 Norbert 在维尔拉与他会合。1940年7月27日，他们一家在驻考那斯的荷兰和日本领事处得到签证，并在6个月后前往日本。由于没通过去巴勒斯坦的船上的安检，他们一家人被迫在上海度过他们的战时岁月。1947年，他们移民到了美国。

Szepsenwol

1939年，寡妇 Rykla Szepsenwol 和她的两个女儿 Fejga 和 Chaya 住在波兰东部的 Volozhin 镇。苏联占领该镇后，她让孩子们和她们的犹太复国青年朋友一起前往维尔拉。几个月后，Rykla 冒险非法越境和她们会合。1940年5月，Fejga 和 Chaya 得到美国的移民签证。在居住在当地的亲友的资助下，并由 Sugihara 提供的过境日本通行证，同年秋天，他们终于离开日本来到美国。一年之后，Rykla 也来到美国。

Lifszyc

David Lifszyc 战前是波兰东北部 Suwalki 市的首席学者。1939年10月末，德国军队占领该地区并强迫所有的犹太人离开。他带着家人冒着危险乘飞机飞越沼泽地来到立陶宛边境。他们刚出生的女儿 Avivit Rashel 不幸在旅途中死去。他们是那些为数不多的能在莫斯科得到过境日本的通行证的难民中的几个。1941年3月，学者 Lifszyc 和妻子 Cypa 还有女儿 Shulamis 搭上了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横穿俄罗斯大陆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同年5月，他们乘船自日本出发来到美国。

“我们感到我们失去了所能知道的一切。但与此同时我们感到我们仍然活了下来乃是上天的恩赐。因为这根本就是一个奇迹、一个意外。我们尽量不让自己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们活下来了，而不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家人？’”

——难民 Yonia Fain